



关于人类心智发展的规范

ON THE NORM IN HUMAN MENTAL DEVELOPMENT

© V.A. Averin

St. Petersburg State Pediatric Medical University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car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aint Petersburg, Russia

For citation: Averin VA. On the norm in human mental development. *Pediatrician (St. Petersburg)*. 2020;11(5):81-90. <https://doi.org/10.17816/PED11581-90>

Received: 07.09.2020

Revised: 12.10.2020

Accepted: 23.10.2020

分析了“心理健康规则”概念的各种方法和模型：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规范，基于机械决定论的原则。A. B. Kholmogorova提供了基于系统方法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 S. Bratus, 批判性地评价了“心理健康规则”定义的这些模型和方法，作为另一种方法强调了人的哲学概念。这允许理解人的本质及人的发展。因此，寻找“心理健康规则”标准的问题可以重新表述为寻找“人心理发展规范”标准的问题，由于重点是人类作为文化发展的所有多样性的结果：作为一个个体，一个人，一个活动的主体，其许多属性的综合表现为个体性。人在文化框架内的发展导致文化意识的形成，文化意识的主要指标是自由、独立、创造性、自给自足和自觉。试图为实现人类心理发展的目标而制定心理工具。在个体人格层面上，这一角色属于个体取向，决定了其对活动目标实现的着重点；在活动主体层面上，这一角色属于个体活动风格。这些人的发展主导因素的相互作用，保证了人的组织各层次的内在统一，形成了“人的完整性”概念，充分表达了文化意识载体一个体的心理内涵。

关键词：心理健康规则；心理健康；文化意识；自由；独立；创造力；自给自足；责任心；系统方法；资助原因；个性；性格倾向；个体活动风格；人类的完整性。

Various approaches and models of the concept of “mental health norm” are analysed: medical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normativ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echanistic determinism. As opposed to them, A.B. Cholmogorova advocates biopsychosocial models, which are based on a systemic approach. B.S. Bratus' singles out the “statistical adaptation approach” and the “adoption of negative criteria of the norm” opposing it,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relativistic and existential” approaches and the “descriptive criteria of mental health” opposing them. Searching for optimal criteria for the norms of mental development the HUMAN BEING is found to be in the centre of consideration as a resul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ll its diversity: as an individual, personality, subject of activit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variety of properties of which is expressed in individuality. The development of a human being within culture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a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 main criteria of which are freedom, independence, creativity, self sufficiency and conscience. They can be considered as criteria for the normal course of a person's mental development. An attempt to formulate psychological tools to achieve aims of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a human being has been made.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personality this role belongs to the directedness of the personality, expressing the relation of an individual to the aims of the activity. At the level of the subject of activity to the individual style of activity.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key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human being ensures the internal unity of all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 human being, resulting in the concept of the “integrity of human being”, which fully expresses the psychological content of individuality the bearer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Keywords: norm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reedom; directedness of personality; individual style of activity; integrity of human being.

心理健康规则问题既是整个心理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其最重要的实践分支——人格心理学、医学（临床）和年龄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9, 10, 16, 18, 19, 22, 27, 32, 35, 37]。

从历史上看，心理学已经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模型和方法来定义心理健康规范的概念。因为在科学史上，理解健康（身体）的第一步是医学方法，然后精神健康也试图在所谓的层次方法的框架内解释，其重点不是精神健康范畴的内容，而是其严重程度（主要是躯体的）——从正常到病理。因此，S.V.Zapuskalov和B.S.Polozhiy区分了以下水平：稳定的心理健康水平、风险水平、疾病前水平、疾病分类学、疾病水平[16]。

S.B.Semichov谈到理想（绝对）规范、类型学规范和宪法规范，它们以性格或个性的强调、心理失调的程度的形式出现，表现为：a) 非病理，b) 病理适应不良（疾病前），c) 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状况，以及已证实的疾病水平[32]。

B.S.Frolov提出了心理健康预测评估系统。他相信这个系统将允许识别健康的，健康的人有良好的预后迹象，几健康的人没有良好的预后迹象，轻度病理的人和严重病理的人[35]。

在医疗或一级方法的框架内，“健康通过不健康、正常状态通过异常确定”[10]。显然，这并没有说明精神规范概念的任何内容，但允许将人们介绍到不同的健康水平（更多的是身体健康而不是精神健康）。

A.B.Kholmogorova分析了心理规范的问题，在科学知识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了规范模型的主要类型。第一个规范和病理学的科学模型是元素主义和机制主义主导的，这在心理学上表现为元素主

义和还原论的结合，“也就是说，试图将精神还原为其他类型的现实——生物和社会学的”[19]。作者认为，科学发展的这一阶段对应于心理规范的第一个科学模型：基于机械决定论原则的生物、心理和社会规范[19]。与这些模型相反，作者提供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其方法论基础是一个系统的方法[11, 21, 41, 42]。参考系统方法的创始人L.von Bertalanfi，作者提出了：“应用到心理学上，这种方法意味着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活跃的个人系统，不寻求建立与环境的内稳态，如经典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但改变和改变这个环境”[19]。A.Kholmogorova在总结了上述心理规范和病理学模型及其众多特殊变体的分析后，强调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特殊作用和重要性。“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是克服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还原论的重要一步，这是解决人类心理健康复杂问题的方法”[19]。

B.S.Bratus确定了以下理解心理健康规范的主要方法：“统计与自适应、文化相对论和存在主义方法”[10]。在对这些方法进行批判性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说，这些方法“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把我们引向明显的病理（如果不是疾病，那么是健康的），或者统计学（如果“像其他人一样”，那么是正常的），或者是适应属性（健康，如果适应得很好），或者是符合文化的要求（如果完成所有处方，那就是正常的），或者是完美的样品（作为人类杰出的、有创造力的代表的个体的健康）”[10]。在回答他自己提出的关于精神规范问题从心理学的局限中滑落的原因的问题时，B.S.Bratus认为，在寻找正常人类发展标准方面的失败表明“要么是心理学本身的弱点，脆弱……或者这个主题（它的起源、关键、基）真的不在心理学领域之内”[10]。“哲学，人的哲学概念”是人们应该寻找的“解决心

理发展规范问题的根源、关键和依据”的领域[10]。为了证明心智发展规范问题分析的重要性, B. S. Bratus指出:“既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人, 在我们关于他的“规范”的观念中, 我们必须从理解使他实际上成为一个人的本质出发……”[10]。因此, 关注的焦点是形形色色的人: 作为一个个体(心理物理生物), 个性(心理社会人), 活动的主体, 在其中将个人的自然属性与个人的社会心理属性的整合和个体性作为个体、个人、主观属性整合的最高层次进行[5,6]。

在《人类心理发展规范》中, 我们认为它具有高度启发性, 因为对正常心理发展标准的定义可能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心理健康。然后, 在认识了现代人发展的可能途径, 了解了什么是一个新人, 他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之后, 就有可能制定人类发展的前景。

在1923年出版的《文化与伦理》一书中, Albert Schweitzer这样描述现代人的状态:“一个没有自由, 脱离、有限的人生, 将他们精神独立和道德判断的权利让给有组织的社会, 面对每一步的障碍, 真正的文化理念的引进, 现代的人徘徊在一个沉闷的时代的沉闷的道路上”[40]。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不仅是一个不自由、有限和脱离的人, 也是一个独立、不人道、相似和好斗的人。Aurelio Peccei(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也持有同样悲观的现代人观点, 他相信“在进化的这个阶段, 人类已经被证明在文化上无法跟上和完全适应自己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30]。一位杰出的俄罗斯思想家S. S. Averintsev认为, “人们继续向更坏的方向转变, 而且变得更快、更激进”[4]。谈论人类危机是恰当的, 尽管它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取得了无条件的成就。这场危机背后至少有两组原因。

第一个是人的内在秩序的原因。这里说的是所谓的规范性和至关重要的发展危机。当然, 很难说是他们挑起了上面讨论的人类危机。但我们也不必完全忽视它们对人类伦理的间接影响。在决定人的本质、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素质的多样性的内在矛盾中, V. D. Shadrikov提到了“异化于自然和与自然的联系, 异化于社会、群体、他人和与他人的联系”[39]。另一组原因是在人之外。A. Peccei认为, “人类的危机不是源于人性本身, <……>它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危机, 是导致人类思维和行为与改变了的现实世界之间产生深刻差异的原因”[30]。A. Peccei在寻找和定义一种“新的人类伦理中看到了走出这场危机的出路, 这将为整个人类的生存提供条件”[30]。A. Schweitzer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人类重生的主要路径就是形成新的世界观的路径, 而形成这一路径的主要工具就是文化。这一观点是基于作者的深刻信念, 即“文化本身是基于一种世界观, 只有人的精神觉醒和道德诉求才能复活”[40]。

E. Fromm强调“人性是文化的产物, 人是人类不断努力的最重要的成就, 我们把这种努力的记录称为历史”[36]。

针对V. S. Bybler关于文化是自由的同义词的观点[8], E. S. Lyakhovich和T. V. Stetsyuk认为文化的主要目的是形成一个人的个性, 如果没有自由、创造力和责任感, 这是不可想象的[25]。N. M. Pakhomov还指出, 需要“在新的文化形式的框架内形成新的历史类型的人格”, 以解决人类危机[29]。因此, 一个人只有形成一种新的伦理, 一种新的伦理世界观, 遵循文化发展的道路, 才能克服自身的危机。人在文化的框架内发展, 获得文化意识的特征, 才能成为自由的、独立

的、人性化的、个性化的人。但这种文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

从对文化现状的分析入手，不难看出文化的危机状态。A.Schweitzer说：“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40]。主要原因是“它的物质方面比它的精神方面发展得更强劲”[40]。A.Peccei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30]。Jose Ortega y Gasset也提到关于文化危机的问题。在分析已经宣告自己的新（前卫）艺术的特点时，这位哲学家说：“我们从各个方面都来到了同一个地方——逃离人类”[38]。

因此，人的异化，所谓人的本真的遗忘，导致了文化的毁灭，之后是人自身的毁灭。因此，当一个“不自由”、“有限”、“在非人的荒野中游荡”的人，全副武装，不仅能够毁灭自己，而且能够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时，人类的问题就产生了。这并非偶然，一些研究人员称21世纪为人类的世纪。

因此，如果文化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因素，那么将文化发展作为克服个人危机的一种方式的可能性是合理的。然后，识别文化的基本参数（价值）就变得有意义了，它决定了相应的人的素质的形成和发展。

正如V.E.Davidovich和Yu.A.Zhdanov, 1684年, S.Puffendorf选择了“文化”这个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15]。在以后，这一概念的深入发展由不同哲学流派的代表进行，包括巴登（V.Windelband[12]，G.Rickert[31]）和文化人类学学院——A.Gehlen, G.Simmel, O.Spengler, E.Spranger[14]。

P.S.Gurevich, 在各种哲学教学的框架内详细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确定了至少三种理解的方法[14]。

第一个是哲学人类学方法，文化被理解为一种详细的人类现象学。同时，根据A.Gelen的说法，文化“是人性，也就是对人性最完整、最全面、最充分的描述”[14]。今天，这种趋势表现为所谓的自然整合原则。

第二种方法——哲学和历史方法，将文化行为视为一种创造过程。P.S.Gurevich说：“文化是一种形成和创造力”[14]。因此，有教养的人就是有创造力的人。

在第三种方法——社会学方法的框架内，文化的价值本质居于首位。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价值表达了文化的人的维度……它似乎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的所有精神多样性都吸引过来了”[14]。

V.I.Ginetsinsky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基本力量”、“创造力”、“精神财富”等概念是“文化”概念具体化的选择[13]。

因此，文化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层面。在第一个框架内，一个人的文化发展意味着他的人性培养，也就是说，它促进人的一切能力的表现，他的自我表现，从而确保他的最完整的发展。

同时，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人创造性力量的发展，因为任何文化的产物都是创造性的结果。

最后，一个人的文化发展总是涉及到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价值、观念、规范的掌握和对它们的占有，也就是形成一种伦理（道德）世界观。由于一个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学习到的价值清单是相当大的，找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很重要的。

考虑到文化价值观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的依赖，N.A.Lurya认为，每个历史

时期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一个人文化发展的价值体系，他把自由作为所有中最高[24]。按照V.E.Sokolov的说法，“文化存在于有理性主权和思想自由的地方”[33]，这在心理上意味着一个人具有自由和独立等品质。因此，自由和独立的价值被优先考虑。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第一，人类文化发展的目标的前提是为充分发挥潜力(哲学和人类学方法)提供条件。正是自我表现的可能性，让一个人最好地看到和实现他的潜力，他最好的一面，以及他的缺点。从心理学上讲，这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即“我-概念”的内容和人与自己的自我关系。换句话说，个人自我意识的发展是自给自足的基础，这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智力正常发展过程的影响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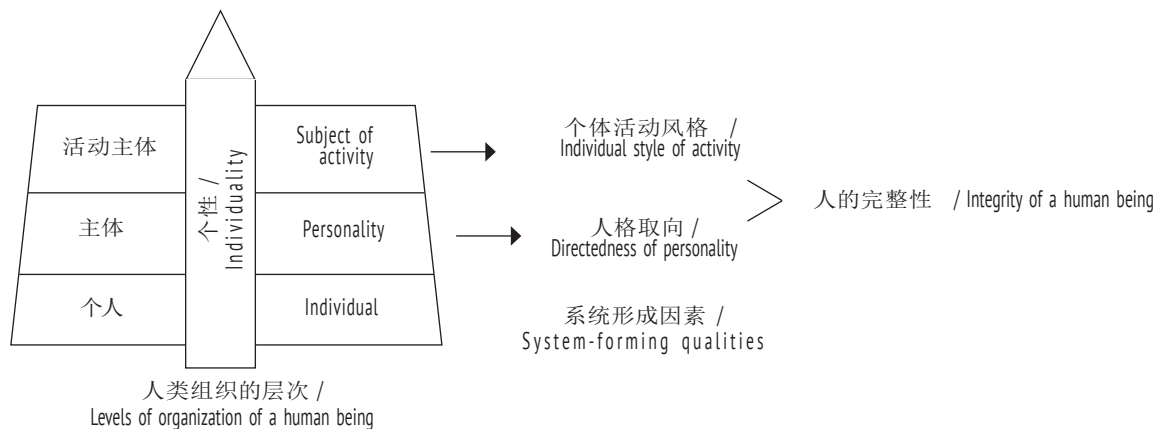
同时，人的文化发展就是人的创造能力的发展(哲学和历史方法)。因此，创造能力是一个人文化发展的下一个指标。

在文化的实际价值(社会学方法)中，选择的可能性是摆在首位的。文化是极权主义和缺乏自由的主要敌人。因此，有教养的人就是自由的人。L.P.Bueva说：“作为一种精神的人，一个人是自由

的，他注定要有选择的自由和一生的文化创造力”[20]。但自由一方面总是与独立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与责任紧密相连。因袭态度是滋生威权主义的基础。独立提供了个人的自主性，它的相对独立性和有意识选择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与责任无关的自由会堕落为无政府状态、叛乱和任性。正如V. Frankl所指出的，“如果不是从责任的角度来看待生活，自由就会退化成为一种简单的任命性”[34]。回想一下M. M. Bakhti的话是恰当的，他说：“在文化发展的框架中，重要的是发展和掌握自己的思想、价值观、规范，而且要考虑到别人的”[28]。在我们看来，一个人的自由、独立和自给自足的行为，在不限他人权利的情况下，是一个有责任心人的行为。V. Frankl坚持培养责任心的必要性，他说：“……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授知识，同时还要磨练自己的良心，让自己有足够的敏感度去倾听不同情况下的要求”[34]。我们要指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席卷全人类的背景下，这两位作者的发言尤为重要。

这一切都意味着理想的文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该图显示了人类结构中不同层次的组织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我们已经知道，系统形成的品质(因素)在



人的心理结构中组织不同层次的相互作用方案及其系统形成特质

Interaction scheme of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ir system-forming qualities in the human structure

个体层面的作用,在这个结构中,个体的自然属性的功能,是由个体的取向决定的。在活动主体的层面上,个体活动风格发挥着类似的作用[1-3]。

个体的活动取向和个体活动风格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社区,这种社区表现为一个人的个人特征和活动特征的统一。这种个体与活动主体的统一性体现在一个人成功的劳动、认知和交际活动中,这决定了他对公共基金的贡献具有独特性。

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品质的存在是形成乐观世界观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它“才能激励一个人以文化的名义行事,〈……〉使他以精神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文化的决定性目标”[40]。

因此,根据A. Peccei的观点,正是一个人的文化发展才能成为“人类的普遍自我完善和自我解释”[30]的基础。正是文化赋予了人类发展真正的人文意义,根据Dennis Gabor的说法,这需要一个人“停止‘展望未来’,开始‘创造’未来”[30]。由此可见,心智正常发展过程的主导战略目标可以也应该是自由、独立、创造力、自给自足和自觉等文化价值观[2]。但发展的目标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完美表现。因此,上述关于一个人的文化发展的价值观可以作为一个人正常心智发展的标准。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B. S. Bratus的方法论立场与本文作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B. S. Bratus和V. A. Averin开始寻找一个人正常心智发展的标准,他们依赖于对“人”概念的哲学解释。然而,在我们的案例中,作为分析人及其发展这一概念的工具,我们使用了文化哲学,即对文化和人的文化发展的哲学理解。

同时,认识到一个人始终是一系列从属的、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的集合,表现

在其组织的各个层次一个体、个人、主体一的众多属性和品质中,有必要寻找一种制度形成因素,一种“制度的有用结果”,它“对制度的形成过程和随后的一切重组都有决定性的影响”[7]。

在B. S. Bratus中,“这种主要的系统形成元素是联系,是对人自身的态度方式”,作为正常发展的条件被创造为的功能结果[10]。作者说:“正常的发展是一种引导一个人获得一般性的人类本质的发展。这项发展的条件和同时的标准是:把另一个人看作是一种自我价值,一种体现“人”的无限潜能的存在(形成系统的核心价值)的态度;分散、献身精神、爱情的能力,作为一种实现这种关系的方式;生命活动的创造性、目标创造性;对积极自由的需要;自由表达意志的能力;自我规划未来的能力;相信理想的目标和计划的可行性;对内对自己和他人、过去和未来的人负责;渴望找到生活中贯穿一生的常识”[10]。

既然我们由B. G. Ananyev提出从,我们从对人的理解开始,人是一个多层次的构成一个体,个人,主体,个性,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表示为一个单独的子系统,它是通用系统“人”的一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根据B. G. Ananyev提出的层次性协调原则建立的[6]。B. F. Lomov在分析作为一般系统一部分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时指出“识别不同子系统之间关系的最重要条件〈……〉是系统形成因子的制定,它将各种机制结合成一个功能完整、动态的系统”[23]。要理解“人”系统的运行过程,首先有必要确定在个体、个人和活动主体层面上作用的系统形成因素的内容,其次,整个系统的一般构成系统的因素是“人”,由于“人”,各个子系统(层次)“结合成一个完整的功能和动态系统”。

在个人层面上,什么是系统形成的因素? B.G. Ananyev分析了个体结构与个体结构之间关系的本质。他注意到“人格结构包括以最一般和与生命和行为有关的有机属性复合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人结构” [5]。因此,个体的特征包含在人格的内部结构中。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对个体和个人都是统一的制度形成因素。图中显示了人的结构中不同层次的组织可能相互作用的关系图。

这种单一的系统形成因素对个体和个人的作用是由个体的取向来表现的,个体的取向表达了个体对活动目标的态度。这一观点是基于一项实验研究的结果,该研究将定向现象作为高等学校教师活动成功的因素[1]。因此,个体的取向,包括职业取向,可以作为个体正常发展的标准之一。

在我们看来,系统形成因素在活动主体层次上的作用是通过活动的个人风格来实现的(见图)。V.S. Merlin指出了个体活动风格的系统形成性质[26]。在V.S. Merlin的观点中注意两点是很重要的。首先,他强调“由于个人风格,不同层次的个体属性之间产生了新的连接” [26]。因此,个人风格的系统形成意义在一个人的整体结构中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层次上得到了承认。其次,虽然V.S. Merlin并没有准确地命名这些“不同层次的层次”,但他指出“个体活动风格在主体的属性之间创造了新的联系” [26]。从而强调了个体风格在活动主体层面上的系统形成价值。这与我们认为个体活动风格在活动主体层面上作为系统形成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是一致的。B.G. Ananyev,考虑到它的结构,认为“一个人首先是主要社会活动的主体—工作、交流、知识……” [5]。这些“社会活动”的内容不可能超出知识、技能,或者用今天的

语言来说,超出一个人的能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V.S. Merlin在定义个人风格时说:“……它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组单独的属性,而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相互关联的行动的权宜之计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一个特定的结果才会实现” [26]。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V.S. Merlin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由于一个完整的行动系统是由于它们之间联系的权宜之计性质而形成的,所以活动的风格不会是错误的。单个动作可能是错误的[26]。

由于至少有三种主要的活动类型在主体的结构上有所区别,因此可以认为根据它们形成了相应的个人风格:认知活动的个人风格,沟通的个人风格 and 工作的风格。后者的风格,反过来,根据V.S. Merlin,也可以以几种形式呈现[26]。在这一对系统形成因素中,个人的取向是主导因素,由于个体对其活动目标的积极态度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因此寻求、发现并将实现个人重要目标的方法引入到一个适当的系统中。强调活动风格的主导地位,我们同意E.P. Ilyin[17]的观点,即单独的活动风格,如果没有高度发展的能力,就不能提供高效的行动。让我们补充一点,能力的发展只有在个人表达的取向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对个人有意义的目标才会鼓励他形成一个旨在实现目标的最佳行动系统。

因此,系统形成因素在个体层面上的作用是由个体的取向决定的,而在主体层面上的作用是由个体活动风格决定的。B.F. Lomova认为,系统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也受到系统形成因素的调节,“……各种机制结合成一个完整的功能和动态的系统” [23]。因此,个体的活动取向与个体活动风格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由于另一个调节因素的作用。

B.G. Ananyev在研究人的结构时引入了个性的概念,他认为个性的概念表征了人格的深度。他强调,“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个性<……>以及各种活动主体的一切属性的内在调节”是在个人中建立的[5]。在我们看来,B.G. Ananyev关于“个性是个体的“深度”和活动主体”的论述,强调了它的功能性本质[5]。个性可以表现为一个矢量,它“渗透”于一个人结构的所有层次:个体、个人和活动主体。每个人永远是一个个体,一个人,一个活动主体,无论形成或表达相应的品质和属性的程度。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是个体,不是在人类组织的每个层次上的个体差异,而是在他们结合的意义。正是这种结合是一个人的能力、素质和属性得到充分发展和表现的基础,当一个人,用Hegel的话说,“把他的精华放在被生产的东西里”,从而对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个性表达了人类组织的所有层次的统一性(见图)。

摘要在揭示了个性在人的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发展的意义之后,B.G. Ananyev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到他的心理现象学问题。同时,他对个体、个人、主体结构心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思考。我们认为,整体性的概念更充分地表达了个性的心理内涵。

系统形成因素(品质)在个体层面上的作用,在这个结构中,个体的自然属性发挥作用,是通过个体的取向来实现的。在活动的主体层次上,个体活动风格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个体的活动取向和个体活动风格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社区,这种社区表现为一个人的个人特征和活动特征的统一[2,3]。这种个体和活动主体的统一在实现其精神发展目标(价值)的人的功能中得到了表达—自由、独立、创造力、自给自足和尽责。

人的正常心理发展是由两个密切相关的系统构成因素的积极互动机制所提供的:个人的取向和个体活动风格。

在上述结构中,整体性的位置在哪里?综上所述,完整性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决定着一个人在其正常心理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成就水平。

人的完整性被理解为系统构成要素的统一:个体的活动取向和个体活动风格,在人的结构中呈现个体、个人和活动主体的层次[2,3]。这就是为什么完整性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对于理解正常的心理发展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心理发展规范的标准之一。

因此,依靠对人的概念的哲学解释,特别是对文化和人的文化发展的哲学理解,首先,这使得我们可以将“心理健康规则”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人的心理发展的规范”问题,其次,界定(制定)这些是这一发展正常进程的规范(指标)。

REFERENCES

1. Аверин В.А. Общая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личности и успешность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В кн.: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зучения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личности учащейся молодежи: Межвуз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НГПИ, 1988. – С. 60–68. [Averin VA. Obshhaja napravlenost lichnosti i uspeshnost vospitatelnoj raboty. In: Psihologicheskie aspekty izuchenija napravlenosti lichnosti uchashhejsja molodezhi: Mezhvuzovskij sbornik nauchnyh trudov. Novosibirsk, Izd-vo NGPI; 1988. P. 60-68. (In Russ.)]
2. Аверин В.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медицин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д-ра психол. наук. – СПб., 1997. [Averin VA. Psihologija medicinskogo obrazovaniya. [dissertation abstract]. Saint Petersburg, 1997. (In Russ.)]
3. Аверин В.А. Цельность личности – субъективный фактор успеш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В кн.: Интегративный подход к познанию психологии человека / под научн. ред. Е.Ю. Коржовой. – СПб.: Изд-во РГПУ им. А.И. Герцена, 2017. [Averin VA. Celnost lichnosti – subektivnyj faktor uspeшной de-

- jatelnosti cheloveka. In: Integrativnyj podhod k poznaniju psihologii cheloveka. E.Ju. Korzhovoj, editor. Saint Petersburg, Izdatelstvo RGPU im. A.I. Gercena; 2017. (In Russ.)]
4. Аверинцев С.С. Попытки объясниться. – М., 1988. [Averincev SS. Popytki objasnitsja. Moscow; 1988. (In Russ.)]
 5. Ананьев Б.Г. Человек как предмет познания. – Л.: Изд-во ЛГУ, 1968. [Ananев BG. Chelovek kak predmet poznanija. Leningrad, LGU; 1968. (In Russ.)]
 6. Ананьев Б.Г. О проблем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ознания. – М.: Наука, 1977. [Ananев BG. O problemah sovremennogo chelovekoznanija. Moscow, Nauka; 1977. (In Russ.)]
 7. Анохин П.К.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В кн.: Принципы систем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функций. – М.: Наука, 1973. [Anohin PK. Principialnye voprosy obshhej teorii funkcionalnyh sistem. In: Principy sistemnoj organizacii funkcij. Moscow, Nauka; 1973. (In Russ.)]
 8. Библер В.С.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Культур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М.: Знание, 1990. [Bibler VS. Nравstvennost. Kultura. Sovremennost. Moscow, Znanie; 1990. (In Russ.)]
 9. Братусь Б.С. Аномалии личности. – М., 1988. [Bratus BS. Anomalii lichnosti. Moscow; 1988. (In Russ.)]
 10. Братусь Б.С. Аномалии личност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 М.: Никея, 2019. [Bratus BS. Anomalii lichnosti. Psihologicheskij podhod. 2-e izd. pererab. i dop. Moscow: Nikeja; 2019. (In Russ.)]
 11. Блауберг И.В., Юдин Э.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сущность системного подхода. – М., 1973. [Blauberg IV, Judin EG. Stanovlenie i sushhnost sistemnogo podhoda. Moscow; 1973. (In Russ.)]
 12. Виндельбанд В. Философия в немец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XIX столетия / пер. с нем. М.М. Рубинштейн и др. – М.: Наука, 1993. [Vindelband V. Filosofija v nemeckoj duhovnoj zhizni XIX stoletija. Moscow, Nauka; 1993. (In Russ.)]
 13. Гинецинский В.И. Знание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педагогики: Опыт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когитологии. – Л.: изд-во ЛГУ, 1989. [Ginecinskij VI. Znanie kak kategorija pedagogiki: Opyt pedagogicheskoi kogitologii. Leningrad: izd. LGU; 1989. (In Russ.)]
 14. Гуревич П.С. Философия культуры. – М., 1994. [Gurevich PS. Filosofija kultury. Moscow; 1994. 317 p. (In Russ.)]
 15. Давидович В.Е., Жданов Ю.А. Сущность культуры. – Ростов н/Д, 1979. [Davidovich VE, Zhdanov YuA. Sushhnost kultury. Rostov-na-Donu; 1979. (In Russ.)]
 16. Запускалов С.В., Положий Б.С.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к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оценке психического здоровья // Обозрение психиатрии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им. В.М. Бехтерева. – 1991. – № 2. [Zapuskalov SV, Polozhij BS. Novye podhody k dinamicheskoj ocenke psihicheskogo zdorovja. *Obozrenie psihiatrii i med. psihologii im. V.M. Behтерева*. 1991;(2). (In Russ.)]
 17. Ильин Е.П. Стиль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аспекты // Вопросы психологии. – 1988. – № 6. – С. 85–94. [Ilin EP. Stil dejatelnosti: novye podhody i aspekty. *Voprosy psihologii*. 1988;(6):85-94. (In Russ.)]
 18. Карвасарский Б.Д. Медицин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 Л., 1982. [Karvasarskij BD. Medicinskaja psihologija. Leningrad; 1982. (In Russ.)]
 19. Клин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 под ред. А.Б. Холмогоровой. В 4-х т. Т. 1. – М.: ИЦ «Академия», 2010. – 464 с. [Klinicheskaja psihologija. A.B. Holmogorovoj, editor. V 4 tomach. T. 1. Moscow; 2010. 464 p. (In Russ.)]
 20.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1995. – № 11. [Kruglyj stol: Filosofija obrazovanija. *Voprosy filosofii*. 1995;(11). (In Russ.)]
 21. Кузьмин В.П. Принцип системности в теории 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К. Маркса. 2-е изд.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0. [Kuzmin VP. Princip sistemnosti v teorii i metodologii K. Marksa. 2-e izd. Moscow: Politizdat, 1980. (In Russ.)]
 22. Лакосина Н.Д., Ушаков Г.К. Медицин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 М.: Медицина, 1976. [Lakosina ND, Ushakov GK. Medicinskaja psihologija. Moscow: Medicina, 1976. (In Russ.)]
 23. Ломов Б.Ф. О системном подходе в психологии // Вопросы психологии. – 1975. – № 2. [Lomov BF. O sistemnom podhode v psihologii. *Voprosy psihologii*. 1975;(2). (In Russ.)]
 24. Лурья Н.А. Ценностно-деятельностная природа образованности и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условия изменения ее типа // Социаль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б. статей. – М., 1992. [Lurja NA. Cennostno-dejatelnostnaja priroda obrazovanosti i kulturno-istoricheskie uslovija izmenenija ee tipa. In: *Socialno-filosofskie problemy obrazovanija. Sbornik statej*. Moscow; 1992. (In Russ.)]
 25. Ляхович Е.С., Стецюк Т.В.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поискам нов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грамотности // Социаль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б. статей. – М., 1992. [Ljahovich ES, Stecjuk TV. Filosofskij podhod k poiskam novej koncepcii gramotnosti. In: *Socialno-filosofskie problemy obrazovanija. Sbornik statej*. Moscow; 1992. (In Russ.)]
 26. Мерлин В.С. Очерк интеграль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и. – М.: Педагогика, 1986. [Merlin VS. Oчерk integralnogo issledovanija individualnosti. Moscow: Pedagogika; 1986. (In Russ.)]

27. Мэш Э., Вольф Д., Детская патопсихология. Нарушения психики ребенка. – СПб.: Прайм еврознак, 2003. [Mjesh E, Volf D. Detskaja patopsihologija. Narushenija psihiki rebenka. Saint Petersburg: Prajm evroznaк; 2003. (In Russ.)]
28.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а к регулируемой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Сб. науч. тр. – М.: НИИВО, 1991. [Образование v uslovijah perehoda k reguliruemoj rynochnoj jekonomike: Sbornik nauchnyh trudov. Moscow: NIIVO; 1991. (In Russ.)]
29. Пахомов Н.Н. Кризис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глоб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для XXI века: Сб. ст. / Ред. – сост. Н.Н. Пахомов, Ю.Б. Тупталов. – М.: Логос, 1992. – С. 18–31. [Pahomov NN. Krizis obrazovanija v kontekste globalnyh problem. In: Filosofija obrazovanija dlja XXI veka: Sb. statej. N.N. Pahomov, Yu.B. Tuptalov, editors. Moscow; 1992. P. 18-31. (In Russ.)]
30. Печчеи А.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 М.: Прогресс, 1985. – 312 с. [Pechchei A. Chelovecheskie kachestva. Moscow: Progress; 1985. 312 p. (In Russ.)]
31. Риккерт Г. Естествоведение и 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 пер. с нем. М.Я. Фитермана. – СПб., 1903. [Rik-kert G. Estestvovedenie i kulturovedenie. Transl. from German. Saint Petersburg, 1903. (In Russ.)]
32. Семичов С.Б. Предболезненные психические расстройства. – М.: Медицина, 1987. [Semichov SB. Predboleznenные psihicheskie rasstrojstva. Moscow, Medicina; 1987. (In Russ.)]
33. Соколов Э.В. Понятие, сущность и основные функции культуры. – Л., 1989. [Sokolov EV. Ponjatie, su-shhnost i osnovnye funkcii kultury. Leningrad; 1989. (In Russ.)]
34. Франкл В. Человек в поисках смысла / сост. Л.Я. Гозман, Д.А. Леонтьев. – М.: Прогресс, 1990. – 368 с. [Frankl V. Chelovek v poiskah smysla. Sost. K.Ya. Goz-man, D.A. Leontyev. Moscow: Progress; 1990. 368 p. (In Russ.)]
35. Фролов Б.С. Система оценки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психического здоровья при массовых психопрофи-
лактических обследованиях. – Л.: Изд-во Военно-медицин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1982. [Frolov BS. Sistema ocenki prognozirovaniya psihicheskogo zdorovja pri massovyh psihoprofilakticheskikh obsledovanijah. Leningrad: Voen. med. akad.; 1982. (In Russ.)]
36. Фромм Э. Человек для себя / Пер. с англ. и послесл. Л.А. Чернышевой. – Мн.: Коллегиум, 1992. [Fromm E. 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Per. s angl. i poslesl. L.A. Chernyshevoj. Minsk: Kollegium; 1992. (In Russ.)]
37. Холмогорова А.Б., Гаранян Н.Г. Культура, эмоции и психическое здоровье // Вопросы психологии. – 1999. – № 2. – С. 61–74. [Holmogorova AB, Garanjan NG. Kultura, jemocii i psihicheskoe zdorove. Voprosy psihologii. 1999;(2):61-74. (In Russ.)]
38. Ортега-и-Гассет Х. Эстетика. Философия культуры / Вступ. ст. Г.М. Фридлиндера; сост. В.Е. Багно. –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91. – 588 с. [Ortega-i-Gasset H. Jestetika. Filosofija kultury. Vstup. st. G.M. Fridlendera; Sost. V.E. Bagno. Moscow, Iskusstvo; 1991. (In Russ.)]
39. Шадриков В.Д.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 М.: Логос, 1993. [Shadrikov VD. Filosofija obrazovanija i obrazovatel'naja politika. Moscow, Logos; 1993. (In Russ.)]
40. Швейцер А. Культура и этика / Пер. с нем. Н.А. Захарченко, Г.В. Колшанского. Общая редакция и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проф. В.А. Карпушина. – М.: Прогресс, 1973. – 343 с. [Shvejcer A. Kultura i jetika / Per. s nem. N.A. Zaharchenko, G.V. Kolshanskogo. Obshhaja redakcija i predislovie prof. V.A. Karpushina. Moscow, Progress; 1973. 343 p. (In Russ.)]
41. Юдин Э.Г. Системный подход и принцип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 М.: Наука, 1978. [Judin EG. Sistemnyj podhod i princip dejatel'nosti: metodicheskie problemy sovremennoj nauki. Moscow, 1978. (In Russ.)]
42. Bertalanfy L. Von Organisation als System. Wiesbaden, 1972.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Vyacheslav A. Averin – Dr. Sci. (Psychol.), Professor, Head, Department of General and Applied Psychology with a Courses of Biomedical Disciplines and Pedagogy of the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St. Petersburg State Pediatric Medical University, Saint Petersburg, Russia. E-mail: waverin@yandex.ru.